

白头犹自在天涯

李黎

孤舟夜泊长淮岸，
怒雨奔腾亦壮怀；
此是少年初羁旅，
白头犹自在天涯。
——台静农《少年行》

今年11月是台静农先生120岁诞辰。32年前他在台北辞世，但许多弟子晚辈至今都记着他；甚至未及亲炙的年轻人，因他精湛的书法而仰慕他。

前年在上海时参观虹口区的鲁迅纪念馆，惊喜地看到展出的历史图片中有一幅“未名社”成员的合影，坐在沙发右首、意志端凝的青年，正是台静农。估计照片里的台先生顶多二十五岁上下吧——1925年，鲁迅、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等人在北京成立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未名新集》半月刊。在那样风华正茂的年龄，台静农已经写出了一系列被鲁迅赞赏不已的短篇小说，集为《地之子》《建塔者》两部。

时光流逝世局变幻，我在台湾大学选修他的“中国文学史”时，他已年过六十五了。历史本科生的我去选修中文系的课，是慕台先生的大名而去的，然而当时我对他的过去却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出国之后才明白：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法”下噤若寒蝉的年代，幸而极少数人知道他的过去，他才能像一块璞玉，暖暖内敛含光而不致粉身碎骨——这不是危言耸听。台先生是1946年应当时台湾省编译馆馆长、鲁迅的侄女婿许寿裳之邀赴台，先到编译馆任职，旋即担任台大中文系教授。1948年2月时任中文系主任的许寿裳在家中遭到惨酷杀害，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半年之后自杀；台先生“临危受命”担任系主任，任谁也会想像有一把颤巍巍的利刃悬在头顶上方吧。从此，台静农走进他“天涯羁旅”的后半生，埋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沉浸书法之海，借毫端挥洒古人诗词以遣怀。

1970年秋天我到美国，接触到台湾的“禁书”，弥补了我对三〇、四〇年代中国文学的那片断层；也终于明白了我在台湾成长的岁月里，从童年、少年到青年，那些遍布周遭、听闻感受到的禁忌与恐惧的真相。阅读那个怒雨奔腾、文学青年们壮怀激越的年代，才回头审视自己在台湾这些年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知识分子的挫折与压抑。待知道了台静农先生是鲁迅弟子，更令我思索两代人、两岸知识分子的传承与悲剧。我无法抑制自己用文字来叩问这段历史的意念，然而这个题目太大，我只能以一个短篇，一个片段——一个人的一天，用淡墨，来写这两代人和两处人，一实一虚。当然，小说里的“实”也是虚的，我借用了台先生的外貌和鲁迅的文名，虚构了“谭教授”和他的恩师“康岳”。谭作纲，一位台北高等学府的老教授，在一个平常授课的日子里，偶然得知他在大陆的恩师康岳去世的消息，压抑多年的内心不禁波涛汹涌。这些年来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从不提恩师；然而当年背叛了恩师的学弟，现在是系里的同事和炙手可热的人物，却写一篇落井下石的文字批判恩师。一贯平易谦和的谭教授终于忍不住了，连夜写成一篇文章，并写好信封预备投寄……却在黎明破晓时分，无奈却断然地撕毁信封，将文章藏进抽屉深处。这就是“谭教授的一天”。

其实对于这两位作为“原型”的个人的一面，和对他们作为师生的交往，我完全一无所知；而正因如此，我的想像可以不受限制。

《谭教授的一天》定稿之后，我用了翻译《美丽新世界》的笔名黎阳，鼓起勇气寄去台湾给尉天懿教授，请他投给我从中学年代就每期必读的文学刊物《现代文学》；没想到竟然不久之后就发表在1971年12月45期，令我喜出望外。后来白先勇先生在《现代文学小说选集》序文里提到：“又如黎阳的‘谭教授的一天’，我认为是描写台湾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上乘佳品，笔触温婉，观察锐利，从头至尾一股压抑的感伤，动

人心弦。”但当时他和《现代文学小说选集》的主编欧阳女士都不知作者“黎阳”是谁。我因为参加海外“保卫钓鱼台”运动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十五年之久无法回台湾；其间发表文章、甚至参加小说奖，也再不曾用“黎阳”这个笔名；后来终于因探母病而能回台，已恍如隔世。记得在一个文化聚会的场合遇见康来新教授，她听我说是台大历史系1969届，问我：“历史系有个写《谭教授的一天》的黎阳，你认得他吗？”我一时感触万端，竟说不出话来。

二十出头时写成的少作竟受到如此注目，不少阅读的人被“谭教授”的形象触动了，不免“对号入座”，甚至随之做出对比。亦师亦友的尉天懿就曾直言：台先生的风骨岂是如谭教授那般退缩？其实不必我多说；虚构小说原本就不能当成史实来对比；但问的人多了我也只得辩解：台静农当然不是谭教授，我只是借用了台先生的外貌和历史背景的吉光片羽，用小说虚构出一个时代悲剧人物的侧影，为的是带出当时真实的大背景和氛围。台先生在壮怀激越之后的后半段人生里，选择了寄情于诗书，掩映胸襟在书册墨香间；我既无意更没有资格写他的真实故事，而最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传记。我不知道这篇小说有没有给他带来些许困扰，多年后见到他时不敢问，但他两次赐我墨宝，我安慰自己：这就表示他没有介意吧。

1985年秋天，我离开台湾十五年后第一次回家，希望能够拜谒台先生，当时担任《联合文学》编辑的丘彦明女士便陪我去温州街“龙坡里”台先生的家。我出国多年怕礼数生疏了，彦明说台先生平易近人不必拘谨，老人家喜爱小酌，建议我带一瓶洋酒呈上。温州街小巷里古朴的日式平房当时依然旧貌，而今已是一则传说了。台大一别十七

载，先生依然谦谦君子，温温如玉。谈话的细节已不复记得；台先生活不多，多半听我们说，他就闲闲地抽着烟；那般温霭安适的神态，三四十年了依然没有磨蚀，因为我常常在记忆里回放。

我大约是说了些去大陆各地旅行的经历——那时去大陆旅行再回到台湾的人还很少。过了几天收到邮寄来的墨宝，是集两首李白的七言绝句：《峨眉山月歌》和《早发白帝城》。看到“夜发清溪向三峡”那句我就心生感激，因为他记住了我提到过曾经乘船游三峡。第二首的第一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台老写成“庐山东望彩云间”，想来是他起意融入了李白《望庐山瀑布》那首。

1987年夏天我畅游北京、西安古迹之后回到台北，带了一套红木笔架拜谒台先生，还是彦明陪我去，也依然是闲适地坐着随意谈些见闻；屋外炎炎夏日，屋里静雅闲澹。过没几天他寄来第二幅墨宝，又是集李白两首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春夜洛城闻笛》。看着“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两句，想那时两岸尚未开放互通，弦外有音而余音袅袅。

好友庄因兄的尊翁庄严先生与台先生是知交，网上流传一幅照片：台先生坐在桌前书写，嘴里衔着烟斗还冒着袅袅烟丝，尚严先生站在近旁低头观看，两人神态安适愉悦（图②）。那幅黑白照片令我打从心底羡慕那一代人的情谊和雅趣，却几乎忘记了他们经受的颠沛流离、忧患痛楚。庄因兄也是书法大家，为人潇洒慷慨，朋友求字几乎都是求必应，因此家中不少承他的赐赠的墨宝，其中最偏爱而悬挂在书房的一条横幅，录的正是台先生的一首未见外传的诗作（图③）：

孤舟夜泊长淮岸，
怒雨奔腾亦壮怀。

此是少年初羁旅，
白头犹自在天涯。
点睛之笔是诗后庄因兄的题跋，竟比诗本身长几倍：

右录静农世伯少年行诗句 昔世伯离乡去京 适逢五四大变 旋中日战起 流徙大江南北 胜利后又因国共纷争 终避乱台岛 卜居北市龙坡之里近五十载 感时伤世 晚年遂有是诗之作 今徽籍女史李黎挈迟花旗十数载 九洲未同 归期难测 他日恐亦有白头天涯之叹 随缘自得 是耶非耶 丙子早秋 庄因在天之涯。

丙子是1996年，其实那时我已“栖迟花旗”远超过十数载了。不过庄因还是细心，点出我是“徽籍”——那正是台先生的祖籍。

我做了一点考证，台先生夜泊淮岸的“少年初羁旅”，应是1919年考进湖北省汉口华中中学的那趟初旅，还不是1922年赴北大就读的进京之旅。庄因兄题跋里说台先生这首诗是“感时伤世，晚年遂有是诗之作”，“晚年”具体是哪年已不可考。从少年壮怀到白头天涯，二十八个字起承转合道尽了一生！我得此作已有二十多年，每天走进书房抬眼可见，却时常心中默诵感触如初。尤其是“白头犹自在天涯”一句，反复吟诵，荡气回肠。想我至今“栖迟花旗”已逾五十载，但早已遍行天涯，也有幸归探故里无数回；而台先生“卜居北市龙坡之里近五十载”，却再也未能重见他的少年羁旅之地。

白首天涯，那位少年踏上旅途之后，永远没有能够回家。

台静农，1902年11月23日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镇，1990年11月9日卒于台湾省台北市台大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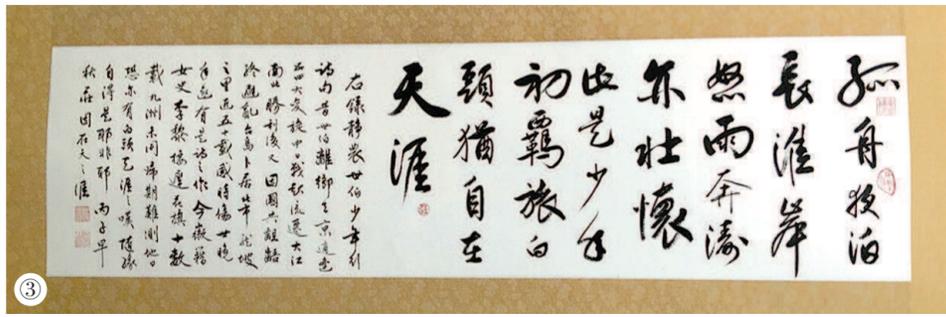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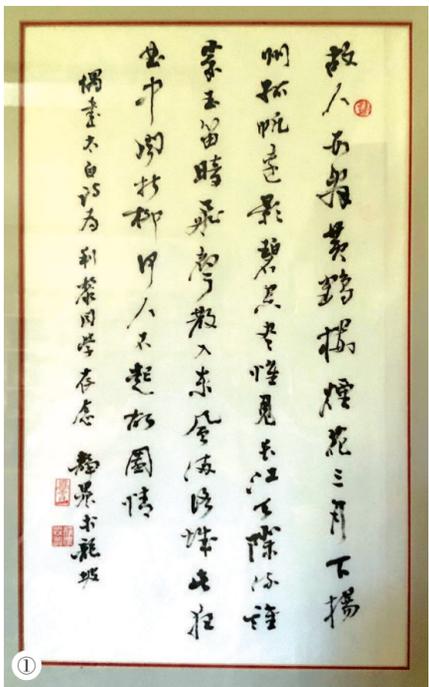
2022年夏至，美国加州斯坦福

笔会

图① 台静农书法

图② 庄严先生与台先生

图③ 庄因书台静农诗



曹操的两位夫人

张婕

曹操的原配夫人姓丁，因为曹操的母亲也姓丁，有人推论丁夫人或许是他表妹。少年夫妻，表哥表妹，感情基础应该不差。丁夫人无所出，早逝的刘夫人生出的曹昂一直由她抚养。丁为嫡妻，昂是长子，且很有出息，二十岁举孝廉，又陪父亲鞍前马后，在军中威望不低，牌面上看，万无一失。

但是事情顺利到某个阶段，总会急转而下，前程远大的继承人在宛城被乱箭射死了。

操率子昂、侄安民、大将典韦攻打宛城，宛城侯张绣自知不敌，放下兵刃带领众人喜迎宛城和平解放，曹操进宛城主要办了两件事，睡张绣的婢女，花钱收买张绣的得力干将胡车儿。一句话评价：不是人。

张绣的叔叔张济，当时死了还不到一年，尸骨未寒。政别说大当家还没死就收买二当家的，张绣就算是个猪脑袋也知道他图什么，立即反了，突袭曹军，曹操一子一侄一大将，尽数葬送在这场“宛城爱情故事”中。

孩子被人杀了，丁夫人不干了，对着曹操每天兜头盖脸地臭骂，无休无止地痛哭。

骂什么呢：“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

——原来她真的很爱那个孩子啊。那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当然，他们有捆绑在一起的共同利益，继承人丧命，丁夫人失去了依傍，是大不利，但假设她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曹操的儿子不少，再过继一个不是难事。曹操对她正于心有愧，她此时若反而温柔小意，陪曹走过这段丧子折将之痛，双方感情必然从甚笃转为巨笃，甚至牢不可破，牌局还没过八圈，未来仍然大有可为。

曹操就是一个合格（高明）的政治家，看他的所作所为，先是祭奠典韦，对众人：“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这一段出自《三国演义》，没有史料记载，但从丁夫人那句“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来推测，杜撰得蛮靠谱的。再是对两年后再度投降的张绣不计前嫌，还亲亲热热地牵起了张绣谋士贾诩的手：“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彰显气度的机会）。”

合格的政治家，即便是儿子的死，也是可以作为政治资本的，化悲痛为力量。

丁夫人不是政治家，她只是一个母亲。

不是“我的儿子死了，你赔什么给我？”也不是“我的儿子死了，我将多么的悲惨！”更不是“儿子死了，夫君你嘴上虽然不说，心里也一定很难过吧？”

是“你害死了我儿子，你为什么还能如常生活？”

那是个好孩子啊，那么好的孩子，你一点都不想念他吗？碧落黄泉都在惦记他的，只有我这个母亲吗？这孩子对你来说，就像块又烧一样吗？

曹操哪里受得了这种气，让人家滚回娘家去想清楚。夫人一去，再也沒有回来。曹老后来去接，甚至“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眼皮都不抬，自顾自织布，两人就此诀别，此生不复相见。

丁夫人的事迹在《三国志》中只有短短四五行，且没有自己的正史，仅作为描写卞皇后贤德的佐证，留下一个浅浅的侧影。但这个侧影却力透纸背，背叛了史家记录她言行的本意，携带着十分鲜明的形象和异常强烈的爱恨对隔着时代或局势变化，人类的情感却始终如一，所以真挚地活过的人，还是能得到一些偏爱吧。

丁夫人出走后，卞夫人（即后来的卞皇后）上位。这一位也是个妙人，三天两头给丁氏送东西不说，但凡曹操滚出去打仗了，她就遣人把丁氏接来，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还要丁坐在上首，她居下位，对丁氏当家主母的地位表示拥戴。

——她居然是真的很为她着想啊。人不能脱离时代和环境，丁氏哪怕再骄傲，也是下堂妇，就算会织布，经济上可以独立，女子在古代仍然是父兄的财产，她能平静地度过余生，卞夫人的态度非常关键：这个人还是我们的人，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得欺负侮辱。

他这样回复我：“这么回事：当年西安的尚友社把魏明伦的川剧本移植为秦腔演出，他们渲染武松矛盾万般，舍不得下手，背过身一不小心，把潘金莲给杀了，我对此非常反感。座谈时，有些人热捧魏剧，我就提出反问：‘你们都跟着魏明伦批判武二爷，假如你嫂子害死你哥哥后又扑过来要和你亲热，你怎么办？’那些人一下子愣了，无言以对。后来听说，他们在下面骂我。我没有写文章。可能是看了你写的武松，正合我意，写了几句读后感，你记的也差不多。”守护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底线，原则问题上不让寸分——戏曲研究也罢，散文写作也罢，这就是董老师的为文之道。

总之，我和董丁诚老师的文字缘，始于天水故乡情的沟通，继之于道德观念的接近，归之于渐行渐远的共同的母校情怀。在西北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借着董老师的《紫藤园夜话》第三辑即将付梓的机会，写此文附之于骥尾，也算是敬献给母校的一束鲜花吧！

师生情与文字缘

杨闻宇

我在1964年进入西北大学就读时，董丁诚老师留校任教已经四年了。他给本科生代《中国古代文论》课，给研究生讲过《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1500年前出现的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的标志性作品，我觉得高深难测，不敢问津。

30多年后，当我阅读将近80万字的两集《紫藤园夜话》时，才发现董老师是一位广泛借鉴了中国传统文体并不断有所革新的散文高手，为文情辞舒畅，雅俗得宜，形成的是一般作者不易进入的境界。我的感觉，也算通感吧，许多比我年长的专家、师友对《紫藤园夜话》热情评介的短文，从1994到1999年间，在秦院的报纸上就出现过20多篇。

从学校毕业后从戎西上，我供职于兰州军区。下部队时，曾多次到过天水，在报刊上也就发表过几篇与天水相关的短文。可能是因为董老师出生于天水吧，我这篇短文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出于对故乡的感情，他就撰文介

绍我写的《天水三章》（报纸发表后收入《紫藤园夜话》）。接着，他还回应拙文《寂寞南郭寺》，写了篇《今昔南郭寺》，《中华读书报》发表时改为《风尘军骑一头小毛驴上山下山》，“唐·吉珂德似的”。借着南郭寺这个天水的著名景点，我与老师从不同角度寄托对世情沧桑的感慨，仔细相比，我的文章显得老气、郁闷，散发着故纸堆的陈旧味儿。

文字上互相往来，让我发觉董老师在散文写作上是一位少有的行家里手，我得认真地向他学习。董老师早就是

个秦腔迷，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也把他审美趣味和大众审美趣味没有间离地焊接了起来。他的戏曲评论文字，不是未涉此行或涉此不深者写得出的。我后来在重读《水浒传》时，起了进一步品评武松的念头，便向董老师发去短信请教：“我记得在讨论川剧潘金莲时，你持不同的见解，具体情况我记不清了。重新翻检你的《艺苑漫笔》，怎么找不着呢？”

董老师对魏明伦编的川剧《潘金莲》指责武松“不懂爱情”，很不以为

